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组编

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

——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引发的思考

李文海 龚书铎 梁 柱 主编

华 龄 出 版 社

前 言

编写这本书，是缘起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一些朋友对大型电视历史剧《走向共和》的讨论。这部电视剧播出后，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众多议论，赞誉与批评兼而有之，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我们注意到，一部电视剧会引起广大观众如此热情的议论，反映了他们对历史剧创作的关注，反映了大多数群众对历史的评价，特别是对近代历史的评价，是有明确的是非标准的。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我们还感到，在对这部历史剧的各种议论中，无论是哪一种意见，都涉及到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究竟什么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近代中国又是怎样走向共和的？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应当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认识历史？这些本来是早已正确解决了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来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这就不能不对史学研究以及历史剧的创作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从正确开展史学研究和繁荣历史剧创作的角度来讲，都要按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辨析，廓清实际上存在的思想理论方面的混乱，是十分必要的、有益的。

应当说，《走向共和》播出后所以会引起众多议论，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真实性问题。这还主要不是指一些具体史实的失真。按照剧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是把这部历史剧定位为是“一部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而他们着力表现的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以及孙中山等人，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都是这部史诗中的“悲剧英雄”。这就把近代中国历史上误国卖国的主要责

任者同革命者一起，都看作是为中国找出路的崇高的探索者；对晚清政府的统治集团为挽救其灭亡命运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则不认为是走向共和的阻碍物，而实际上把它看作是走向共和的起点。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与此同时，该剧为了把慈禧等人塑造成所谓的“悲剧英雄”，就极力宣扬一种要使人物“人性化”的历史观。诚然，过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对人性问题采取粗暴的一概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对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把人性和阶级性截然对立起来，用抽象的人性去描绘历史人物，编排历史的情节，这显然是走到了错误的另一极端。这里所谓的人性，按他们的说法，就是“坏蛋也有温柔宽厚的一面”，这正是该剧所着力表现的。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所不同的是，经过这一番“人性化”，把好人说得坏一点，把坏人说得好一点，这样就把历史上的反动人物打扮成“历史的推动者”。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早就有的以“心之力”捏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重现，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唯物史观相违背的。

上述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即尊重历史事实和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这是史学研究和历史剧创作都必须坚持的两大原则问题。诚然，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允许在某些方面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创造，但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不能违背上述原则的。

“走向共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事件。今日的中国已经在一个崭新的世纪线上起步，也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尽管这样，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及其历史命运，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不仅关系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正确评价问题，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

周知，我国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近代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现在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正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如果这种革命发展的历史被任意涂改和颠倒，那势必引起群众的思想混乱，这就有可能影响一些人对现实社会制度的看法。因此，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走向共和》这部历史剧，对历史的歪曲是十分明显的。我们知道，自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遭到惨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当时有识之士无不惊呼：国家已处于“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语）。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时，英、俄、德、日、法诸国，实际上都做了瓜分中国的准备。这表明，这时中华民族危机严重到了极点，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令人悲愤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不论大小，几乎都曾经欺负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无一不是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为结局。这是为什么？毛泽东指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正是这两个原因，造成外侮纷至、国势日衰、被动挨打的悲剧局面。

因此，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首先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腐败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创造必要的前提和条件。这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走向共和”的矛头所向。当时社会一切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都必然在

这个根本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度，接受“站队”的历史检验。而作为革命对立面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在它面临灭亡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些带有欺骗性的改革，诸如晚清政府搞洋务、新政一类的措施，但是又怎么能够把这种捞取救命稻草式的举措看作是“在中国找出路”，而与革命者救国强国的探索相提并论呢？至于他们对待列强侵略的态度，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反动统治者总是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与特权作为衡量利弊的标准，什么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可以作为同外国侵略者讨价还价的砝码，以求得它们的庇护和垂青。在近代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近千个不平等条约，既是列强炮舰政策加恫吓欺骗的产物，也是中国反动统治者软弱无能和寻求外国靠山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沉痛指出的：“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这确是一针见血的揭露。令人费解的是，在《走向共和》这部历史剧中，却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一贯主张“外须和戎”、取悦列强的李鸿章，都描绘成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高大形象，这同近代中国历史的真实相去何远！

当然，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孙中山领导的走向共和斗争的伟大功绩，同时又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以便更好地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民族蒙羞、国人罹难的险恶情势，在爱国拯民情怀的激励下，开始了对历史的思考和对出路的探索。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热心于传播西方的“新学”，企图从西方的文明中汲取振兴中国的养料。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惟一可供中国人选择的出路。无数仁人志士曾为此奔走呼喊，流血牺牲，并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延续了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历史性成就。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奋斗精神，同样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是，时不予我，外国有的，中国却不能有，辛亥革命的结局和尔后的局面，深刻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求得富强的历史机遇。所以如此，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控制了中国，它们不容许中国因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而成为其强大的竞争对手，它们需要保持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衰弱的中国来无限制地扩大其在华的权益，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屡遭帝国主义绞杀的深刻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太软弱，失去了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本阶级要求的能力。近80年旧式民主革命为我们提供的最主要的历史经验，就是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救国自强的有效武器，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的思想界，他们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苏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终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历史选择。

毫无疑义，“走向共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历史剧这一艺术形式，再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使广大观众在观赏中获得历史知识的教育，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走向共和》这部历史剧的创作意图及其所展示的内容，却是同这样的要求南辕北辙，实际上它是在“走向共和”的名义下，极力打扮美化封建营垒的代表人物，把他们说成也是“走向共和”这部史诗中的“悲剧英雄”。这样做，究竟要告诉观众什么呢？这样做，恐怕连李

鸿章们也是始料未及的。

我们深深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及其发展规律，旗帜鲜明地提倡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正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初衷。

围绕上述问题，我们邀请一些学者撰写文章。特别是为了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这个历史，我们还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论近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收入本书，以飨读者。同时还收入了已故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等4篇已发表过的文章。

本书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编。在编写过程中，樊建新、曹智伟、郝清杰同志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特此致谢。

编 者

2003年8月

目 录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论近代中国社会与革命.....	(1)
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金冲及 李文海 龚书铎	(41)
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	刘大年 (53)
辛亥革命：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金冲及 (81)
共和国的追求——孙中山与毛泽东两位伟人的奋斗.....	林家有 (93)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	张海鹏 (113)
论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	宋小庆 (131)
《走向共和》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历史观点？”.....	李文海 (144)
《走向共和》严重歪曲历史.....	龚书铎 (153)
史剧必须尊重历史 爱憎应当明辨是非——关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几点思考.....	张 磊 张 苹 (160)
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宣扬什么历史观.....	张海鹏 (170)
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颠倒.....	梁 柱 (184)
不要以人性去说明历史——对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一点看法.....	董学文 (191)
历史正剧应当实事求是.....	耿向东 刘达丽 (201)
要害就在历史观.....	叶 梓 (207)
尊重历史，才能展现历史——评电视剧	

《走向共和》	龚 云 (214)
从 “ 走向共和 ” 在中国何时起步说开去	
——兼评历史帝王剧的非历史误区	张祖涛 (220)
清皇朝 “ 情结 ” 探源	
——评电视剧《走向共和》	石 英 (226)
如何正确评价慈禧和李鸿章	许启贤 (236)
翁同龢与晚清政局	谢俊美 (241)
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	史革新 (256)
历史上真实的李鸿章	史革新 (281)
慈禧太后其人	曾光光 (292)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政坛	张昭军 (302)

孙中山 毛泽东 邓小平

论近代中国社会与革命

原编者按：邓小平同志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也说：“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

现代的中国是从近代中国发展而来的。近代中国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这样那样的影响延续至今。正因为如此，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少问题，特别是关于近代中国革命和重要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和讨论。进行学术讨论以至争论，是很正常的事情。历史的经验表明，这种讨论和争论应该也只有建立在尊重史实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有益于分清是非、形成共识，有益于得到正确的结论和借鉴。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

平，是20世纪“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同时，他们又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为了有助于正确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有关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特摘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论近代中国社会与革命》，以飨读者。

孙中山的论述

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瓜分豆剖”；
清王朝“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
绝不可能“将国家加以改革”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自与万国交通以来，不知外交，屡召战祸，丧师辱国，于弃民割地之外，益以赔款。甲午之役，赔款连息四万万；庚子之

役，赔款连息九万万。政府无力，则令各省摊赔。于是各省督抚借此为名，举行杂捐，剥民自肥，自柴米油盐以至糖酒诸杂项，皆科重税；居陆则有房捐，居水则有船捐。民不堪其苦，屡屡激变；则辄调兵勇，肆意焚杀，洗村铲地，以为立威之计。思之心伤，言之发指！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6页

四海之内，人民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而深宫之内，穷奢极欲，日甚一日。据最近调查，报自乙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三百余万，虏太后万年吉地工程每年百余万两；戊戌秋间虏太后欲往天津阅操，令荣禄兴修行宫，提昭信股票银六百余万两；辛丑回京费二千余万两；辛丑后兴修佛照楼五百万两；虏太后七旬庆典一千二百余万两，另各省大员报效一千三百万两。共计此数年之内，虏太后一人所用已盈九千余万两。辛丑至今又阅数年，其费用可比例而知。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17页

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我们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历史表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

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8月31日），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页

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尔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惑，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想由这样的政府及其官吏厉行改革，会有什么希望呢？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1904年8月31日），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1—252页

上书请愿的和平改良之法“无可复施”；
李鸿章等人的仅仅输入铁路、电话等
“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洋务之策，
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
而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

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

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触接较近，其于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利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寝阁不报。顾中日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且谓此等陈请变法之条陈，以后概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恍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军界，盖海陆军人腐败贪黷，养成积习，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伦敦被难记》（1897年初），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

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是这种输入如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就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897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页

凭着戈登 将军和其他外国人的帮助，李鸿章从太平天国的手中夺回了地盘。不久，他就被提升为总督。李曾经累积了怎样大量的财富是远近皆知的，就用不着在这里多提了。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各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897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99—100页

在英国，有人以为只要能说服李鸿章等人，使他们相信铁路、电话、欧洲陆军和海军组织等的效用，启发中国人民，并设法把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那么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制餐具，想藉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897年3月1日），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3—104页

革命与保皇“不能混淆”，必须 推倒清朝专制，“创建共和”

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如弟与任公 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

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

《敬告同乡书》（1903年12月），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2页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在东京 民报 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文 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

《建国方略》（1917至1919年），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

袁世凯“背弃誓约”、“暴行帝制”，
当与国民共讨之

曩者苦满清虐政，国民共起革专制为共和。而民党笃信人道

主义，欲减少战争流血之惨，故南北议和，使清帝退位，后举袁世凯为总统，袁亦誓守约法，矢忠民国。乃自彼就任以来，背弃誓约，违反道义，虽用共和国之名，而行专制帝王之事。国民怨怒，无所发舒。乃其暴虐甚于满清，而统驭之力，又远不及，故两年之间，全国变乱频起，民党之必兴，革命军之必再见，无可疑者。

致大隈重信 函》（1914年5月11日），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页

今袁 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袁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呜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国家生命于袁氏哉！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讨袁檄文》（1914年5月），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0页

文自束发受书，知忧国家，抱持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终始不替；所与游者，亦类为守死善道之士。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达。乃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